

晚清



四大词人

刘红麟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5103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1011146B）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BB183）

湖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09B044）

晚清 四大词人 研究

刘红麟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四大词人研究 / 刘红麟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648 - 0832 - 7

I. ①晚… II. ①刘… III. ①词 (文学) —诗词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3055 号

晚清四大词人研究

刘红麟 著

◇责任编辑: 欧继花

◇责任校对: 钟坚成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 mm 1/16

◇印张: 18. 75

◇字数: 336 千字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832 - 7

◇定价: 26. 00 元

序

明清时期苏州曾经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远离政治中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近代以降，随着上海口岸的开放，以及太平天国的战争冲击，苏州东部海隅上海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而迅速崛起，取代苏州而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文化中心。传统的、新进的，老派的、新潮的，各色文化人聚集在苏沪一带，形成了清末民国时期光怪陆离、充满张力的独特人文景观。作为新兴的传媒——报刊，首先在上海、苏州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报刊领地也因而集聚起一大批文化人，而传统的版刻印刷也得益于从西方引进的新式机器而发生转型，得到全新的发展。这诸多有利条件为文化人施展才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运，无论你秉持什么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这些客观条件都能为你所用，西化少壮，文化遗老，新文学弄潮儿，旧诗文殉道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大舞台。这就造成了上海与苏州开放与封闭，激进与保守兼容并存的独特文化风貌。

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都是遗老，籍贯都不在沪、苏，但晚年都与沪、苏结下不解之缘，也许与沪、苏独特的文化生态有关。王鹏运，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同治十三年（1874）26岁以内阁中书入仕，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54岁时南归，期间除丁忧服阙外，一直居住北京，之后至光绪三十年（1904）于苏州暴病而亡，期间寓扬州而时往来于沪、苏。况周颐，蕙风词隐，广西临桂人，光绪十四年（1888）28岁入都，翌年官内阁中书，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南下金陵入张之洞幕，期间虽数次南游，但仍以北京为家；而离京后，则基本生活于江南，辛亥革命，清亡，遂定居沪上，直至民国十五年（1926）病逝。郑文焯，大鹤山人，辽宁铁岭人，光绪元年（1875）20岁在京中举，官内阁中书，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七次会试落第，遂绝意进取，自

镌印“江南退士”，弃官南游，遂定居苏州，直至民国七年（1918）病逝。朱祖谋，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28岁传胪及第，历官会典馆总纂总校、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光绪三十年（1904），出为广东学政，因与总督不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50岁辞官北归，遂乔寓苏州吴氏听枫园，与郑文焯为邻，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冬去世。

此四人雅好文化传统，因词而结缘。王鹏运年最长，32岁时受常州词派端木采影响醉心词道，开始填词，并在北京桂林籍龙启瑞之子龙继栋觅句堂作词会，每聚多广西亲友，所谓临桂词派遂得以兴。四人中朱祖谋结识王鹏运最早，光绪八年（1882）二人初会于汴梁，光绪九年（1883）再逢于京师，而延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彊村始从半塘学词，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与半塘再校《梦窗词》。况周颐则于光绪十四年（1888）初识王鹏运于京师，翌年从其治词，得“重、拙、大”之旨，光绪十八年（1892）助为校勘《梦窗词》，其后又助校《四印斋词》，期间，蕙风曾因返临桂而途径苏州，拜识郑文焯，蕙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离京后，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与半塘重会于扬州仪董学堂。而郑文焯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始识王鹏运，并应邀加入半塘主持之咫村词社，时朱祖谋亦已为社友，大鹤与彊村之结识当亦在此时，而大鹤则有邀半塘卜居姑苏半塘彩云桥之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半塘游苏，将《梦窗词》校刻本赠与大鹤，乃有大鹤《手批梦窗词》。光绪三十四年（1908），彊村据此再校《梦窗词》成。在此期间唯况周颐与朱祖谋尚未有一面之交，直到民国元年（1912），况、朱二人皆寄寓海上，始成过从之缘。民国二年（1913）彊村三校《梦窗词》成，是为《梦窗词集》本，民国六年（1917），彊村又校刻《彊村丛书》成，堪称词史一大盛事。由此四人之交往可知，对于词道的钟情，是他们共同的纽带。

这四人都曾经是热血青年，在政治上赞成革新，是戊戌变法的拥护者，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强大，但是在辛亥革命后，又都成为前清遗民，他们都挣脱不了不仕武朝的气节观念的束缚。在此后的政治舞台，他们与陈三立类似，基本上都是“神州袖手人”，而把一身之精力付与了词道，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身理想。他们游于词道之艺，在词道中托物言志，获

得精神的超越。而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最富有人文艺术的氛围和情趣，实在是诸君子寄寓的福地。

近代以来诗文都有“革命”的倡导，唯独词道不见革命的呼声，大概因为词道最在乎形式的纯粹，一旦革命，词的命也就没了。词道的这种保守性，也许最切合这些具有深厚文化积累和极高艺术修养的文化遗民的志趣，也使他们有了可以大展身手的空间。正是这种冥冥之中的投契，才有了“国家不幸词家幸，词到晚清境更工”的词道中兴气象，中国的词到了行将落幕的时刻居然有一大片璀璨夺目的绚美晚霞飞上天际，大放异彩，让人震撼不已！

作者刘红麟，出自湖南，屈骚的诗魂，湘绮的浸润，孕育了他丰富的才情。本世纪初，红麟在苏州大学从我读博期间，对晚清四大词人发生浓厚兴趣。我于词学本无研究，但觉得四大词人与苏州有缘，苏州的大学理应在研究方面要做点贡献，因此很支持他作此研究。三年过去，红麟如期拿出了厚厚的《晚清四大词人研究》这篇博士论文，当时评阅老师王水照、黄霖、钟振振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傅杰教授等，都给论文以很高的评价。毕业以后，红麟回岳阳某大学任教，我曾问过他论文出版的情况，但是他觉得论文如要出版还不够成熟。这在当今甫一脱稿，唯恐出版不及的急功近利时代，有如此想法十分另类，足见红麟做事之认真，治学之严谨，对学术之敬畏。而这一修改几乎将近十年。上个月他联系我说，论文经修改后即将出版，并问序于我，我由衷感到欣喜，这不仅是因为这部研究近代词学的重要成果即将问世，而且还在于那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得到了发扬。

红麟以《晚清四大词人研究》为题，有他的深意，因为目前学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将此四大词人作为同一个流派来看，或称为“桂派”，或称为“彊村派”，或称为“清末常州派”，而本书认为此四大词人，不能算是一个流派。这样的立论需要勇气，因为持流派观的学者大多是词学权威，有的是泰斗级人物，但学术的进步就需要这样立异和求实的勇气。红麟的看法有他的理由，且能自圆其说。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观点，全书在结构上就不能按照流派研究的写法安排，但既然将此四大词人合在一起研究，又应该有其内在的共性，故又不能写成四大词人单论的合集。为此作者采取了总一分一总一分一总的结构方式，第一部分绪论，以四节讨论四

大词人的词学关系，辨析其是否构成流派的各种要素，并进而阐发四大词人创作成就与清词中兴的原因。第二部分先分论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再继而分析四大词人的词学共性与个性，其个性突出，而其共性又不足以构成流派的要素。第三部分先分论四大词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在此基础上又归纳出四大词人的词作在主体意识、艺术审美方面的共性和个性。如此四大词人研究既突显了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个性，又呈现出了他们作为一个词学群体的整体性。结构完整，论述周全。而在论述过程中又不时将四大词人置身于晚清整个社会风云际会的大转变和文化大转型的背景之中，将宏观的思考与微观的分析紧密结合，故能做到妙义纷呈。而文献史料的发掘钩稽又相当丰富，故引证充分妥帖，体现出了学术研究扎实的功力。语言表达又文采斐然，引人入胜。总之，这是一部踏踏实实的优秀学术著作，我很愿意为之推介。要了解精彩的内容，请赶快进入此书，一睹为快！是为序。

马亚中

壬辰闰四月初一改定于姑苏丑石斋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节 研究现状、对象界定及其方法	(001)
第二节 思想承传：词学流派之影响	(007)
第三节 风气所趋：词社活动之展现	(015)
第四节 因缘际会：晚清词复兴之契机	(021)

上编 词学编

第一章 王鹏运的词论	(031)
第一节 重拙大词旨论	(031)
第二节 尊体论	(040)
第三节 声律论	(045)
第二章 况周颐的词论	(049)
第一节 重拙大论	(049)
第二节 寄托论	(057)
第三章 郑文焯的词论	(065)
第一节 清空论	(065)
第二节 乐理论	(074)
第四章 朱祖谋的词论	(085)
第一节 体格、神致并重论	(085)
第二节 作家论	(094)
第五章 晚清四大家词论之异同	(104)
第一节 四家词论之共性	(104)
第二节 四家词论之差异	(109)

下编 创作编

第一章 半塘词	(115)
第一节 半塘词的题材	(115)

第二节 半塘词的悲剧意识	(133)
第三节 半塘词的艺术风貌	(140)
第二章 蕙风词	(156)
第一节 蕙风词的题材	(156)
第二节 蕙风词的艺术风貌	(176)
第三章 大鹤词	(190)
第一节 大鹤词的题材	(190)
第二节 大鹤词的艺术风貌	(205)
第四章 彊村词	(217)
第一节 彊村词的题材	(217)
第二节 彊村词的艺术风貌	(227)
第五章 晚清四大家词之共性	(238)
第一节 四家词主体意识之共性	(238)
第二节 四家词艺术审美之共性	(252)
第六章 晚清四大家词之差异	(262)
结语	(268)
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85)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对象界定及其方法

叶恭绰《清名家词序》曰：“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朱陈导其流，沈厉振其波，二张周谭尊其体，王文郑朱续其绪。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异。迄于易代，犹绮余霞。今之作者，固强半在同光宣诸名家笼罩中，斯不可不谓极盛也已。”^①他在词史演进中梳理了清词发展的轨迹，并特别提到晚清词学的骎骎盛况。

张尔田《彊村遗书序》亦曰：“（彊村）下与陈晁竞爽，上与向歆比隆，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使声律小道，高跻乎古著作之林，与三百年朴学大师相揖让乎尊俎之间，在于三累之上。呜呼，可谓词学之极盛已。而先生自为词，亦复跨常迈浙，凌厉踪朱，迢然而龙鸾翔，邈然而兰茗发，拟之有宋，声与政通，如范如苏如欧阳。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熏三沐，尤近觉翁……即并世词流，半塘之于碧山，叔问之于白石，夔笙之于梅溪，翦芬散条，殆亦莫能相揜。”^②在这里，他回顾了清词的辉煌历程，总结了清词发展史上四次盛事，而以晚清词学为极盛。在他看来，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正是造就晚清词学极盛的核心人物。蔡嵩云《柯亭词论》中将四人并称为“清末四大词家”是较早的提法。彊村弟子龙榆生有《清季四大词人》一文，因撰文时其师尚在人世故未列入。陈匪石《与圭璋书》中说：“暨大季刊读悉龙君诸作，实深纫佩，而四大词人之评鹭，尤为实获我心。此皆弟所亲炙或私淑者，校勘属王，鉴赏属况，千古不易之论，若学为词，则两家不可偏废，大鹤先生亦长于议论，

① 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1册，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2页。

② 朱祖谋：《彊村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22-7123页。

曾有论词书，载国粹学报，系答孟劬之问者。二十余年前，弟居吴中，时陪末席，茅塞为开，只今思之，前尘惘惘，盖与沅老同一风义平生之感也。”^①可见龙榆生所论在当时词界即已得到了普遍赞同。因此，后世学者皆沿用此论，迄今为止，王、朱、郑、况为晚清四大词人（或曰清末四大词人，晚清四大家）的提法早已成为共识，无须赘言。

王鹏运（1849—1904），字幼霞，又字佑遐，中年自号半塘老人，又号鹜翁，晚号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人。同治九年（1870）本省乡试举人。十三年（1874）以内阁中书分发到阁行走，旋补授内阁中书。久之，升内阁侍读。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中城，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升礼科给事中，转礼科掌印给事中。二十二年（1896）春，上疏谏阻皇太后驻蹕颐和园，几罹祸。直谏垣十年，朝中大臣，弹劾几遍。力主行实政以弥外侮，故于戊戌变法，乃全力推行之。庚子厄变，国事渐不可为，二十八年（1902）请假南归，主讲扬州仪董学堂。随后染病不治而歿。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因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字夔笙，或作葵孙，号蕙风，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广西临桂人。祖籍湖南宝庆，后迁广西，遂为桂林人。赋奇才，有神童之目。1879年乡试举人。1888年入都应礼部试，遵例官内阁中书。寻以会典馆纂修叙劳用知府分发浙江。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慕其才望，延赞幕府。宣统元年（1909），至大通掌樞运，辛亥九月，闻警赴沪。自此留寓上海，结束了南来北往的漂泊生涯。生事日艰，卖书鬻文为活，经济极为窘迫。蕙风以逊清故老渴盼复辟，而于袁世凯僭位之谋多有讽刺。晚岁栖迟薳落，赍恨以殁。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别号瘦碧，又自号樵风园客、大鹤山人、冷红词客。先世居汉北海郡高密县通德里，为郑康成之裔。先祖为关东海岛镇守协镇，从师入关，赐隶汉军正白旗下。故为旗籍。光绪元年举人。屡应会试不第，遂南游苏州，侨吴三十余年，为江苏历任巡抚幕僚。辛亥革命后，幽忧哀愤，以遗民终老。行医卖画以为食，先后却清史馆纂修与北京大学教授之聘，以坚志节。朱祖谋（1857—1931），一名孝臧，字藹生，又字古微，号沅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人（今湖州）。光绪九年（1883）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戊子科江西副考官，戊戌科会试同考官，教习庶吉士，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迁侍读庶子，至侍讲学士。庚子义和团作，抗疏极谏，几被祸。两宫回銮，“有留

① 龙沐勋编：《词学季刊》创刊号，第211—212页。

心外事之衰”，而以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甲辰，出为广东学政。因与总督龃龉，以疾辞去。卜居吴门。江苏创立法政学堂，应聘为监督。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袁世凯礼聘为高等顾问，不与通一字。1925年，以君臣之礼一谒天津行在，涕泣辞去，遂以遗老终其一生。晚清四大家是晚清词坛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

词发展至晚清，词境几已开拓殆尽。就千年词史的大势而言，已渐呈垂暮景观。然而，时势人心与词学积累却造就了为千年词史结穴的晚清四大家。严迪昌先生称其为“暮色初起时焕映出的一抹暗红幽艳的晚霞”。晚清四大家是末世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生活在一个亘古未有的变乱时代，在内外交困的生存处境下，开始了承袭传统、挑战现实的文化苦旅与人生蜕变。他们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心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文化思维与文学样式去观照国事民生，并在文化剧变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审美与理论的新变，从而全方位地影响晚清词学的发展流程。他们不仅精于治词、论词、编选词书与校勘词籍，而且组织词社，开展词学活动，他们“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①影响了整个晚清词坛，使晚清词学赅然极一时之盛。他们一方面继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旨，融浙入常，吸收前贤论词精诣，集词学之大成；另一方面，力求超越前贤，开拓创新，结合时势人心与个人经历，提出了“重拙大”、“体格与神致并重”、“清空骚雅”的词学思想，又勘校词籍，整理考辨，开创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同时，奖掖后进，培育人才，直接影响了近现代词学格局。晚清四大家在晚清词坛领袖时流、转移运会、拯衰纠弊、开拓推衍之功，功莫大焉！因此，研究晚清四大家，不仅有着重大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甚至还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晚清四大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专著有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张正吾《王鹏运研究资料》、谭志峰《王鹏运及其词》、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词学及词作研究》、巨传友《临桂词派研究》等，硕士论文有刘兴晖《郑文焯研究》、秦玮鸿《况周颐词集校注》、朱存红《王鹏运研究》等。这对于丰富和发展晚清四大家研究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学界研究成果多为近年来的

^① 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08页。下引此书，注释从简，不再标版本，只注页码。

学位论文，处于潜成果的状态。而且，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总体来看，零散、微观，缺少整体性、宏观性、系统性的研究，对于四家创作与词学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联系，对于四家的生命状态与文化心态及其对创作与词学的影响，对于四家与近代词坛的关系，对于现代视野中学人对四家的接受，对于政治文化剧变与词学嬗变的深层联系，对于晚清词起落兴废的因由，对于晚清词学的新变等，都缺乏直接与间接的介入。由此看来，晚清四大家还有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将它置于晚清政治文化剧变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宏观审视，以考察他们的生命状态、文化与美学状态，是崭新的研究课题。

鉴于此，本著作将晚清四大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视其为一个密切相关的词学群体。四家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创作、理论、校勘学以及词学活动，乃至他们的身世经历、个性精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无法分割的联系，四家在晚清词坛所显示的地位与影响往往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故此，当时叶遐庵戏呼为桂派：“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① 蔡嵩云亦许之为清词第三期词派：“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羨派同时……常州派倡自张皋文……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②

龙榆生则视其为常派一脉：“……而常州一脉，乃由江浙而远被岭南，晚近词家如王、朱、况、郑之辈，固皆治张、周之涂辙，而发扬光大，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③ 后世学者径沿此说，直标其为清末常州词派，如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说：“（常州词派）经过嘉道年间周济，同光年间谭献、王鹏运、朱祖谋、陈廷焯等几代词人的共同努力，逐渐成为一个有着独特词学理论体系与创作风格，在清中、末叶影响较为广泛的文学流派。清末常州词派，是指活动在同治、光绪年间的谭献、王鹏运等人。

① 叶恭綽：《广篋中词》，沉辰垣编：《御选历代诗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2页。

② 蔡嵩云：《柯亭词论》，《词话丛编》，第4908页。

③ 张正吾等编：《王鹏运研究资料》，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他们在国家、民族被难的动荡岁月里，对常州派的词学遗产有继承，有扬弃，也有新的审美选择与创造。他们的词作，表现了封建末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意绪与心态，并在风格上呈现出多种流向。”^① 钱仲联先生则以影响力论称之为“彊村派”，他说：“这派的中心领袖是朱祖谋……朱氏之所以成为派的中心领袖，一则他先在京师时与王鹏运共同探讨词学，趋向基本一致，再则朱氏晚年卜居苏州，郑、张、陈诸人都聚集于吴下，形成风气……这许多词家，围绕在朱氏周围，成了‘彊村派’的群体，陈曾寿、夏敬观也是声气相应求，况氏在词学理论上更有建树，提倡‘重、拙、大’，与朱氏词作相契合。朱氏门弟子众多，宣传标榜，其声势超过了常州派。”^② 业师马亚中先生《暮鼓晨钟》中亦主此说：“彊村派便是清末一个最重要的词派，它几乎集合了清末最有影响的一些词人，如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张尔田、陈锐等……朱氏卜居吴中时，郑文焯、张尔田、陈锐等也都会聚一城，共同倡导周邦彦、吴文英的词学，相互切磋酬唱，一时蔚为风气。朱氏不仅创作成就很高，而且还在整理出版词集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学者所尊，更扩大了他的影响。所以把朱祖谋作为该派的中心人物是比较恰当的。”^③ 另外，严迪昌、谢桃枋，朱荫龙皆以地域呼之为临桂词派。^④

上述学者皆命四大家为晚清一大词派。所谓文学流派，“应是指这样一种作家群体：他们共处于一段特定的时期，在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上相近或相似，从而形成了在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的一股势力。”^⑤ 张宏生先生认为应具备以下要素：“第一，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第二，有着公认的领袖；第三，在这个领袖周围有一个创作群体；第四，这个群

① 任访秋等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页。

② 钱仲联选注：《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页。

③ 马亚中：《暮鼓晨钟》，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110页。

④ 严迪昌《清词流派述要》云：“王鹏运、况周颐均系广西人，朱祖谋先擅于诗，后受王鹏运影响而专力为词，故时人又有‘临桂派’之称，其实桂派的词学观，渊源仍在‘常州词派’，是常派的余波一脉。”（详细参阅王步高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第138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谢桃枋云：“张惠言的《词选序》成为了常州词派的宣言……经董士锡——特别是这一派的理论家周济的修正与发挥，对近代词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晚清的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词家，也属此派。”（详参谢桃枋：《中国词学史》，第29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朱荫龙云：“……谓‘自然从追琢中出’……于是天下之归于雅正……并足羽翼之，蔚成风气，方是临桂之词派始成。其所造之深，影响后世之巨，论者以为清代文派之有桐城，殆亦无逾于是也。”（详参朱荫龙：《校录临桂三家词记》，《临桂三家词》，1941年手稿）

⑤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体有着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风格。”^① 吴宏一《常州派词学研究》也说：“我个人以为文学史上的所谓流别，除了时代社会背景等外在因素之外，其形成应该具有下列的四个要素：1. 有作品树其楷模。2. 有理论推波助澜。3. 有同志闻风响应。4. 有后人沿流承风。”^② 这是接近现代意义的流派理论。就古代的实际情况而论，一个流派很难完全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应具备最基本的要素，即明确的理论宗尚，相近的学古取向与相似的艺术风格。

就四大家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开宗立派的词学主张。王鹏运发明的重拙大理论并不具备开山采铜的宗派影响，在他那里少有阐述，从而使之缺乏具体内涵。重拙大理论并没有成为各成员共同遵循的理论原则，它更不足以牢笼近现代词坛。朱祖谋、郑文焯于词学理论中只字未能涉及重拙大，而其创作也并未以之为指南。即使与半塘有衣钵之传的蕙风，其理论亦与半塘大相径庭，而且蕙风词亦不符合半塘之重拙大标准。半塘夙尚体格，强调整顿缔造之意，蕙风更重性灵，并不仅以寄托为高。蕙风性嗜艳情，体耽侧艳，追求淫艳之风至死不改。这一点与其他三人大异其趣。因而受到半塘的严厉批评，也引起大鹤的强烈不满。彊村艳词绝少，曾多次批评竹垞耽于绮语、渔洋喜唱冶春词等，想来对于蕙风，只是未形于色、露于言而已。同时，大鹤以清空论独树一帜，与另外三家迥然不同。大鹤论词作词，独尚清空，以清虚空灵为美，他多次提到其词力求疏澹而彊村词质实致密之差异，而对彊村选僻调、用难字，好为人所难能以至于艰深晦涩的倾向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其实，四人词学宗尚的不同是与其学古取向的不同分不开的。尽管四人学古倾向与路径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就其侧重点而言，是不相同的，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半塘之于碧山、蕙风之于梅溪、大鹤之于白石，彊村之于梦窗，时人早已有论。半塘激赏碧山“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之以缠绵忠爱”，深受其深微淡远、沉郁缠绵词风的影响。史达祖才情横溢，其词语精字炼，瑰奇警迈，他以咏物与艳情的形式反映兴亡之感与矢志之悲，开创了奇秀清逸的词风，蕙风循之，更以侧艳写沉痛，真挚处犹有过之。大鹤得白石之幽韵冷香，其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极富清空妙致。彊村善学梦窗，即致密即沉着，深文远旨，终以密丽质实为胜。由此可知四人师法宗尚及其词风之大异。此外，四人对于声律、校勘的看法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由此看来，晚清四大家无论词学宗尚还是创作风格，明显体现出清空与质实，格调与性灵，侧艳与雅正

①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② 吴宏一：《清代词学四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71页。

的对立倾向，尽管四人身气相求，唱和成风，但严格说来，他们并不处于同一流派层次上。就四家本人的意思而言，也似乎并不赞成开宗立派。大鹤曾说：“凡为文章，无论词赋诗文，不可立宗派。”^① 半塘晚年遍学诸家，转益多师，固已治众制于一炉。彊村更是集大成者，其后期治南北宋而一之，跨浙迈常，豪婉兼顾，疏密并收，早已泯除宗派之迹，呈现出大融合的趋势，力足以为千年词史之大结局。鉴于此，本著作并不将四大家视为一个词学流派，而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密切相关的词人群体，如此，也许更为恰当。

因此，本著作选择晚清四大家这个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词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把他们放在审美与文化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审视，通过对晚清政治文化的扫描，解析晚清四大家的生存与文化场圈，考察他们在政治文化剧变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考察它们对创作与词学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深入挖掘晚清四大家在文化、审美、创作与词学思想方面的独特个性。同时，将四大家放置在晚清词史的广阔发展视野中，研究他们的词学活动，研究他们与晚清词人群体的关系，研究他们对前人的承继与超越，借以探讨晚清四大家承前启后的历史联系，考察晚清词兴衰起落的历史动因，揭示晚清词学嬗变的轨迹与规律，从而在流变与文化的动态视野中界定四大家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第二节 思想承传：词学流派之影响

清代词学流派众多，词派理论的繁衍与承传往往左右着词坛风尚，作育了词人与群体。就晚清四大家而言，他们与常州词派有着直接的渊源，同时也接受了清代其他词派思想的影响，如浙西词派与吴中词派。这里仅就三大词派影响于四大家的词学理论，作一简明扼要的交代，以作为四大家的研究背景。

一、常州词派

1. 比兴寄托

常州词派自张惠言开山以来，特重比兴寄托。张惠言《词选序》云：“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

^①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词话丛编》，第4332页。

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宕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隐吁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① 张氏以为，词正是一种比兴寄托的文体，情思感物而发，以微言出之，低回要眇，以表现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微言可喻大义，以其迷离惝恍之致，幽约深曲之思，通于风骚之旨。但他所说的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主要是指士大夫的不遇之慨与忠爱之忱，他所言之物与情，象与理是一种机械比附的关系。这样，以比附风骚的方式，强化词体功能，使比兴寄托渐入词坛，而词体益尊，但其弊在于穿凿附会。周济的比兴寄托说则宏通得多。首先，他认为词应寄托的是家国身世之感，就其内涵而言，比张惠言更为深广。同时，他也提到此种感慨应是主体的由衷之言。这样就涉及寄托中物与情，主与客之间的有机结合的问题。他将寄托分为两个阶段：低级与高级阶段。他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② 求寄托是其根本要著，高级阶段并非不求寄托，只是并不刻意寄托，尽管不求寄托却有寄托。因为酝酿已久，情感积淀成熟，而又遇机缘和合，故而物我融浹，主客浑融，达到不求寄托而有寄托的浑化之境。这样，一方面坚持了寄托论，同时又遵循了寄托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从而显示出他的合理性与独特魅力，为常州词派寄托论开了无限法门。此后的常派论者多承继周济之说。谭献在他的基础上更为强调以词体委曲隐幽的形式表现折衷柔厚之旨。他说：“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③ 谭献一方面强调词承载政治社会功能的容量，另一方面则推崇诗教大义，在他看来，词正以其反映世变合于王道的方式，体现它的政教讽喻功能，所谓以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由此看来，他的寄托论已开始趋向于强调委曲幽深的比兴方式，以及诗教讽喻之旨。当时与谭献齐名的庄棫，其旨趣亦与之相合。但

① 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第1617页。

②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1630页。

③ 谭献：《复堂词录序》，《词话丛编》，第3987页。